

記「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 學術研討會

• 任劍濤

一 會議機緣

2001年8月23-25日，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舉辦了「中國近現代思想的演變」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是思想史意義的「自由主義與中國」。與會的有兩岸三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大學機構的30餘位學者。

這次會議因緣而成。一方面，正如會議開幕式上致辭的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教授幽默地點出，與會者是抱着與天氣一樣熱烈的心情，討論一個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下國內以及西方的社會政治生活狀況，促使人們關注自由主義話題。

二 源流辨析

對於漢語學術界來講，一涉及到自由主義這樣的現代政治哲學話題，就不得不先行處理這種政治哲學理論與中國悠久而深厚的政治文化傳統的關係問題，同時也不得不疏理在自由主義的原生地西方社會淵源深厚的理論脈絡。於是，關於自由主義的源流辨析，即對於自由主義的歷史演變的辨析，便成為漢語學界討論自由主義與中國話題的重要理論問題。

這次會議的與會者正是沿着這兩條線索來探討自由主義的源流問題。一條線索是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西方源流辨析。這是由自由主義誕生於西方社會所決定的。與會者在討論中強調，漢語學術界必須在弄清楚原生的西方自由主義的來龍去脈的基礎上，才可以結合漢語文化語境，探討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建構問題與現實實踐訴求。因此，與會者在討論中對於西方從古典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關注有加。對於十九世紀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尤其是羅爾斯(John

Rawls)的自由主義理論，更是傾注了理論熱忱。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對於第三種民主的言述，也成為與會者評論自由主義民主與共和主義民主的參考框架。

二是自由主義理論的中國源流辨析，這可以說是本次會議的中心論題。這當然與會議組織者和與會者共同的、強烈的中國關懷有關。這一問題實則可以換轉為二：一是清末民初之前，中國傳統思想中究竟是否存在自由主義思想資源；二是清末民初之後，自由主義在漢語文化語境中的文化傳統源流問題。就前一論題而言，與會者在「中國思想史與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的題旨下面，加以了集中探討。台灣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教授周昌龍專門考察了明清之際中國「近代」新自由傳統的建立。他以李卓吾思想為例，指出當時中國已經形成系統性的「近代自由傳統」，走出了內在自由之作為中國自由傳統的唯一關懷境地，使得儒學具有了包括政治管理、生存能力、經濟獨立等在內的形體自由設計。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孝悌則論析了十八世紀中國皇權與禮教之外的自由傳統。他以樂利主義為自由的言說軸心，論述像袁枚等人伸張的飲食男女問題具有的私域自由義涵。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金觀濤、劉青峰教授分析指出，胡適和戴震的哲學方法有驚人的一致性。他們認為戴震之所以能夠尖銳批判宋明理學「以理殺人」的指責，不僅是由於明末以來對於情理的申述，更在於他對個體經驗的重視，這些與自由主義有着旨趣上的一致性。他們並通過這一比較得出結論：中國式自由主義的核心乃是一種「常識的個人主義」。另外，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天綱、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潘光哲、復旦大學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博士後鄧志峰，也分別從清代中西思想交匯、「知識倉庫」、晚明王學等視角對於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進行了挖掘。

與會者在探討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的同時，更對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演變關注有致。這種關注的焦點投射在兩個問題上面：一是關乎中國自由主義發生學的清理，即具有關鍵意義的「五四」與自由主義的關聯性問題；二是關乎中國自由主義發展的「系譜」建構問題。前一點其實是一個可以作放大處理的問題域。與會者通過對於「五四」前後時期中國思想界的多元考察，勾畫出從嚴復引介自由主義進中國到五四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的發生發展情形。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黃克武對於嚴復傳輸自由主義的思想特點做了分析。他指出嚴復「一方面譯介、宣傳自由主義，另一方面則誤會、批判西方的自由理念，因而形成了一個有異於西方模型的中國式自由主義」。而嚴復這種試圖結合東西價值、混合西方的積極自由與中國的利他觀念、愛國心與追求富強願望的思維方式，對於此後中國的自由主義論說產生了極大影響。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則以《努力》周報為例，考察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貢獻與失敗。他對於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處於嚴重的社會思想分化氛圍中的、以胡適為核心的一批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引介與宣傳進行了研究，指出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着眼點在於申述原則，而匱乏行動能力。這注定了他們的失敗。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院的高力克教授對於杜威(John Dewey)與「五四」新自由主義關係的分析、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童世駿對於李大釗與穆勒(John S. Mill)思想關係的剖解，都讓我們了解到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與中國自由

主義言說的複雜關聯性。其他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義章對「五四」時期胡漢民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台灣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梁台根對胡適思想的傳統性與現代性的探論、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對胡適與陳獨秀關於自由立場差異的分辨、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楊對於救亡、馬克思主義與現代性在中國傳播方式的疏理，也都對於「五四」時期中國自由主義的全景描摹，具有幫助。

至於中國自由主義現代傳統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一個歷史呈現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當代勾畫的問題。前者是說在思想史上確實顯示了一個中國自由主義言述的連貫線索。後者則是說我們對於前一線索需要進行理論清理，以便對於自由主義的中國言說者之間的複雜關係，有一個更好的理解。因為如此，後者成為這次會議的中心論題之一。從線索上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章清致力於建立中國自由主義「傳統」的「系譜」。他以自由主義的「中國化」為軸心，一方面勾勒出自由主義的中國言述線索，另一方面則對這種言述的問題意識進行了串聯，使得人們可以對處於傳統與現代、批評與建設的緊張關係中的中國自由主義言述，有一個歷史大印象。從主題上看，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丘為君則致力於凸顯圍繞「權威與自由」關係而延續的中國自由主義近代歷程。他從個人意志與集體意志、自由與倫理兩個視點，對於中國自由主義言述之無法健全處理權威與自由的關係，表達了他的遺憾之情。在同樣的論旨下面，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王焱對於近代中國的兩種自由傳統做了分疏，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允起對於現代中國的「自由社會主義」加以了論道，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中江則花了紮實的功夫，圍繞《觀察》周刊，對於中國自由主義認同及其困境做了分析，對於自由主義者的理想主義與精英主義取向，以及自置於政治事務之外的行動方式進行了批評。

三 東西差異

歷史源流的分疏背後，當然潛蘊着理論分辨問題，而這種理論分辨又因為分別被安頓在中西社會文化背景中，不得不使研究者高度關注它們各自的理論邏輯。因為，如果不清楚它們各自的理論邏輯，以及這一邏輯背後的實踐指向，就既會混淆中西方自由主義的不同理論旨趣，又會混淆中西方自由主義不同的社會處境，尤其是難以明瞭中西方社會「自由主義何為」這一大問題的答案。對於自由主義的這種理論處境，這次會議的部分論者有一種理論敏感。他們從西方自由主義的理論問題與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近況兩個視角，探討不同社會處境中的中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問題。

自由主義在西方社會背景中、以及在西方社會政治理論架構中的論證問題，一直是一個影響西方主流社會發展的重要話題。這中間有三個必須予以重視的具體問題：一是自由主義(尤其是政治自由主義)據以成立的中立性原則的證立；二是引起廣泛反響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所採取的進化論論證進路是否成立；三是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秩序與科學理性是互補還是顛覆關係的關聯性

問題。恰好在這次會議上，三位專家分別對此做了論述。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石元康指出，以往自由主義理論家總是想一方面迴避主觀主義和懷疑主義，另一方面又想證立自由主義的中立原則。他認為這樣不可以證立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只有從主觀主義或懷疑主義出發，自由主義的中立性原則才有證成的空間。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錢永祥則強調，像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那樣以進化論的進路陳述自由主義，是不妥當的理論選擇。因為演化論的推論對於自由主義所必須堅持的底線——道德個人主義會構成威脅或傷害，演化論注重的是物種或群體的演化、適應、存活、或則滅亡。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克艱對於人們慣常的對峙科學理性與進化基點上的自由秩序加以了批評。他指出波普爾(Karl Popper)基於科學哲學研究而申述的「批判理性主義」與哈耶克基於自生自發秩序申述的「進化理性主義」之間，並沒有一種對峙性關係。他從玻爾(Niels H. D. Bohr)的互補觀點出發，指出了二者間的協調性。與會者對於三位學者的論述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意見各有不同，但是都肯定他們的理論嘗試。

與西方社會處境大不相同的中國社會，自由主義在中國當代思想界的理論求索過程中，已經成為引起知識界共同興趣的話題。但是，猶如與會者將眼光投向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史時具有差異很大的分歧一樣，他們對於當代情景下中國自由主義理論言述的邏輯定位問題，既有很大的研究興致，又有相當歧見。從二十世紀90年代末的所謂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着眼，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許紀霖撰寫了長篇論文，討論兩種自由與民主，並反思「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爭論。他將前者視為西方語境中的自由主義民主的合法繼承者，將後者視為西方語境中的共和主義民主的合法繼承者，而他申述一種基於哈貝馬斯的程序主義民主基點的民主新模式，以避免「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偏頗。廣州中山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教授任劍濤則認為，由於中西方社會處境的巨大差異，我們申述自由主義的理論原則時，不能落到單純的西方語境之中。他主張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的理論定位應當落在今天中國人看似不太完美的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基點上，而不是落在看似完備的西方新自由主義理論基點上。許、任的不同主張，引起與會者的不同反響，各有其衷心的贊同者和激烈的批評者。

四 實踐期待

兩岸三地學者聚首一堂討論「自由主義與中國」的話題，可以斷定，這些學者不只是為了鍛煉自己的智力。在理論探討背後的深厚動力，就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社會政治實踐。可以說，對於自由主義的實踐期待，比之於對自由主義的理論興致來講，要顯得強烈。所以，與會的相當部分學者，對於自由主義的實踐問題表現了高度關注。這類關注，大致關乎三個具體論題：一是自由主義在中國大陸地區實踐的失敗教訓總結，以及自由主義在當代台灣的相對成功的

實踐經驗歸納。二是自由主義實踐中需要處理的與傳統政治運作方式的關係問題。三是自由主義在當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實踐有效性的檢討。

從第一個方面來看，中國自由主義實踐史的回顧，乃是一個一切為二的問題：失敗教訓史與成功經驗史。前者可以分為1949年前與1949年後兩個時段來觀察。1949年前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欠缺成熟，既可以從前述論者的分析看出，也就可以解釋他們無以影響當時中國政治進程的原因。1949年後，自由主義在大陸成為「毒草」，就更是徹底喪失了影響中國政治生活的可能性。關於這一點，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季倫通過對於1949年後知識份子的改造，做了事實描述與歷史分析。關注這一論題，更多論者將後一方面的蘊涵做了相對深入的開掘。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賀照田舉出深刻影響了台灣自由主義思想與實踐的重要人物——殷海光所著的《中國文化的展望》，藉以分析自由主義的中國言述與政治實踐所面臨的諸難題。台灣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薛化元則以台灣著名的行動派自由主義者——雷震為例，重述自由主義在台灣實踐中的周折，以及帶給人們的自由民主憲政設計的重要性。台灣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副教授張世雄則將問題坐實，以台灣的社會政策為例，考察分析自由民主在台灣成功實踐後處於一個新社會格局中所面臨的新問題。

從第二個方面來講，自由主義實踐中需要處理的與傳統政治文化的關聯性問題(如德治)，也引起了一些與會者的注意。在大陸政治情景中發生的「以法治國」與「以德治國」並舉企圖，推動學者去探討「現代德治如何可能」的問題。就此，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陳少明圍繞法律的道德價值、道德評價與法律規範，對於現代德治的條件進行了清理。

從第三個方面來說，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西方社會的主流政治言述，在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效用究竟如何，是一個需要再次檢驗的問題。與會的部分論者對此懷抱不無益處的警覺性。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博士提醒人們，注意作為權力集團崛起的跨國公司存在的消解人們自由的危險性，並勾畫了一個從國家一個人、到公司一個人的限制自由的演變過程，進而提出以國家限制公司，以保證公民自由的思路。

與會者對於自由主義的強烈價值顯求與實踐效用推崇，可能蘊涵着某種我們應當警惕的偏向。因此，對於這一話題保持清峻的理性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如此，批評的聲音對於自由主義的理論言述與中國實踐乃是極其重要的事情。一些前輩學者告誡年輕學者，不要落於虛玄的自由主義辭藻的怪圈，要追求真正的深刻思想。金觀濤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這次會議具有多學科對話的特點，初步揭示了中國現代思想與傳統的連續譜系；這個課題尚需更深入的研究。這次會議的討論氣氛十分熱烈，與會者一致指出，討論時間太少，使許多大家共同感興趣的問題沒能展開深入討論。為此，陳方正所長提出，這樣的會議在今後每兩年召開一次，歡迎兩岸三地學者繼續深入研究、認真討論。